

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社会地位与 主观阶层认同分析

——兼议如何构建主观阶层认同上的橄榄型社会

崔 岩 黄永亮

提 要: 本文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阶层认同情况进行了研究, 目的在于揭示要实现社会结构的稳定, 不仅仅应当在客观收入上构建橄榄型社会, 更应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身份上对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本文使用中国社科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 2015) 的数据。调查发现, 在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或者社会下层, 即存在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的倾向, 且不同世代的群体在社会阶层认同方式上存在代际差异。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大力促进民生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逐步消除具有制度性歧视的社会政策。

关键词: 中等收入群体 社会阶层认同 橄榄型社会 代际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一直是社会学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作为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产阶级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国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国也进入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 我国社会各阶层出现分化和重组, 阶层构成比例逐步发生着变化。比较明显的是,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正逐渐增加。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 (Radler, 1912),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李培林等认为, 要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

入者比重，并借助国家治理，综合运用市场调节、政府再分配以及强化家庭的再分配功能等多种手段达到建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目的（李培林，2015；李培林、张翼，201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等收入者比例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主观上也认同自己处于中产阶层。这种身份不认可，一方面反映了其对自身当前收入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的不信任（李春玲，2016）。而这样的不满和不信任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建设橄榄型社会，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不仅包括在收入结构上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持续扩大，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其主观身份认同与收入上的一致性，即实现其对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换言之，仅仅在客观收入指标上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并不能代表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其社会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更不能将经济收入增长所形成橄榄型社会与社会形成稳定的结构相等同。然而，相关的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通常会出现下移的情况（刘欣，2002；李培林，2005；高勇，2013；冯仕政，2011；李春玲，2015，2016），也即在经济收入上达到了中等以上水平收入的群体依旧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社会中下层或者社会下层。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试图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的数据进一步挖掘和探讨中等收入群体身份下移的程度和影响因素，以便从理论上探索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底层认同倾向，实现其在主客观指标上的一致性，为确保我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橄榄型社会提供理论证据。

二、文献梳理和研究假设

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工业化进程迅猛发展。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随之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李培林认为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开展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对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李培林等，2017）。

尽管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middle income group）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其又被称为中产阶层（middle class）或中间阶层，但含义大体是相同的。目前的研究依

据不同的指标体系研究和探讨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特征，并普遍承认了采用中等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的合理性。美国经济学家南茜·伯兹奥尔等人认为可以通过收入中位数法来定义中产阶级（Nancy et al., 2000）。我国学者肖文涛认为中间阶层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肖文涛，2001）。李春玲认为，可以从职业、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这几个维度来确定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李春玲，2003）。还有学者从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三个指标出发，将中产阶级分为三个类别：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以及边缘中产阶级（李培林、张翼，2008）。钟茂初等以定量界定的方式，通过恩格尔系数将系数介于0.40—0.30的人群界定为中产阶级（钟茂初等，2010）。朱迪则认为中产阶级是指工作稳定、物质生活比较宽裕，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人（朱迪，2017）。

尽管以往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采用中等收入来衡量中产（中间）阶层的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特征，但在中产阶级主观身份认同上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所谓社会阶层的认同，指的是阶层内部成员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的认知和感受。从收入来看，尽管我国中产阶级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占比日益增加，但人们对中产阶级主观认同的步伐却尚未完全跟上（冯仕政，2011）。例如，CGSS2006的数据显示，“农民阶级”认同的人数占比为45.8%，“工人阶级”认同人数占比为41.5%，两者合计达到87.3%，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只有6.95%，但很多并不在这6.95%中的人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冯仕政，2011）。也即中等收入群体对自己目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达到理论和现实意义上中间阶层的相应表现。

在现有对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下移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刘欣通过“相对剥夺感”来解释主观阶层认知，认为人们的阶层认知不是简单取决于其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刘欣，2002）。李培林从“认同碎片论”角度出发，认为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呈现“碎片化”趋向，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地位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且距离会越来越大（李培林，2005）。高勇则从“参照系转移”的角度出发，认为阶层认同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参照系”的转移，之前的“参照系”是共同体的归属，而现在则转变为个体对市场机遇的占有（如收入）（高勇，2013）。李春玲认为由于人们本身过高的物欲期待和不满足心态，会进

一步导致群体性焦虑，继而致使很多中产阶层对自己中产身份并不认同。这样的身份认同下移或错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当前自身职业、收入和地位等处境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感问题。从人们的身份认同来看，这样的身份认同下移会使人们的主观认同形成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随着“80后”、“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也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现有研究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分析时，通常把这一群体看作一个整体，无论是“相对剥夺”视角，还是“群体性焦虑”视角，都没有对该群体的内部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不同世代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因而可能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存在代际差异。具体来说，“40后”、“50后”、“60后”群体完整地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对“阶级”有着特殊的认识和回忆，而这种成长历程很可能对他们的社会阶层认同产生影响。而对于“70后”、“80后”、“90后”而言，其成长、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他们的社会认同方式与前几代人有显著区别。例如，在市场经济时代，“阶级”、“阶层”等概念被赋予的主要是经济意涵而非政治意涵，这样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不同世代的群体在社会阶层认同上有所差异。具体来说，本研究认为，因为更倾向于对自身的经济水平进行上行比较，中等收入人群中的“70后”、“80后”和“90后”比“40后”、“50后”和“60后”更易发生阶层认同下移。此外，结合以往文献，我们认为受访者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焦虑感越强，制度性歧视感越强，越不认同中产阶层的身份。并且这三个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可能具有代际差异，且就这三个因素对不同世代的人群在主观阶层认同上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本文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整体分析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不同世代群体在阶层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三、调查数据与统计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15）的数据。该调查采用PPS概率抽样和入户问卷访问方式，共访问了10243名城乡居民。CSS在抽样设

计上采用了多阶段复合抽样 (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 的方法, 即分县/市/区、居委会/村委会、居民户、居民 4 个阶段抽样, 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最终共抽取 151 个县/市/区下属的 604 个村委会/居委会。收集的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和操作化上, 本研究借鉴了收入统计值 (中位值、百分位值等) 作为参照标准的方法, 以受访者的家庭平均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 将收入等于中位值的 0.75 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 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 0.75 倍但是低于中位值的 1.25 倍 (包括 1.25 倍) 的人群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 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 1.25 倍但是低于中位值 2 倍 (包括 2 倍) 的人群定义为中高收入群体, 将收入高于中位值 2 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朱迪, 2017)。进而将全体样本划分为社会下层、社会中下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上层。其中, 家庭平均收入为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中上层的群体被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

(二) 统计模型

本研究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其次, 本文继续采用了异质选择模型 (Heterogeneous Choice Model, Williams, 2009; Allison, 1999) 处理 Logistic 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 从而实现参数的无偏估计。具体来说, 本研究试图分析不同世代的中等收入人群在主观阶层认同上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采用普通 Logistic 回归中时, 其前提条件是自变量值域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是确定, 然而这一假设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中都不能完全成立; 换言之, 对 Logistic 回归中假设的同方差是错误的, 这会导致参数估计产生偏差 (Rijmen & De Boeck, 2002; Yatchew & Griliches, 1985)。为了调整自变量值域变动导致干扰项方差的差异对自变量参数估计的影响, 并使得参数之间可比, 我们对广义异质 Logistic 回归模型扰动项增加了一个估计量 σ , 从而对变量不同取值中的回归模型的参数进行整体估计。换言之, 对不同的变量, 估计量 σ 可以取不同取值, 而不是一个固定值。估计量 σ 正是体现了变量不同值之间干扰项方差的差异对模型整体参数估计的影响, 并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调整, 同时对 Logistic 模型的参数和不同变量的不同值域的残差项进行估计, 即 $P(Y_i > j) = \text{invlogit}\left\{\frac{\beta_{0j} + \sum X_{ki}\beta_{kj}}{\sigma_i}\right\}, i = 0, 1, \dots, j, k = 1, 2, \dots, n$ 。(Allison, 1999; Long & Freese, 2006)。通过允许 σ 在不同变量的不同取值上有变化并进行估计, 可以对模型的参数估计进行修正。

四、调查结果

(一) 中等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描述统计结果

首先，我们对中等收入群体是否认同其属于社会中产阶级进行整体分析。数据表明，38.0%的受访者认为其属于社会中层，33.5%认为其属于社会中下层，更有24.6%认为其属于社会下层。当被进一步问到其家庭是否处于社会中产地位的时候，仅有28.1%认为其家庭属于中产阶级，71.9%均表示其家庭不属于社会中产阶级。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对其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地位出现下移情况。不同地位社会群体在面临对其社会地位现状评估时会产生社会认同威胁 (Scheepers & Ellemers, 2005)。

其次，从不同世代人群的主观阶层认同来看，在中等收入群体中，不论哪个世代，均有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或者社会下层。具体见图1，在“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中等收入群体中，分别有52.35%、60.65%、57.99%、56.32%、61.88%、55.4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或社会下层，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的受访者均在4%左右，而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上层的受访者则几乎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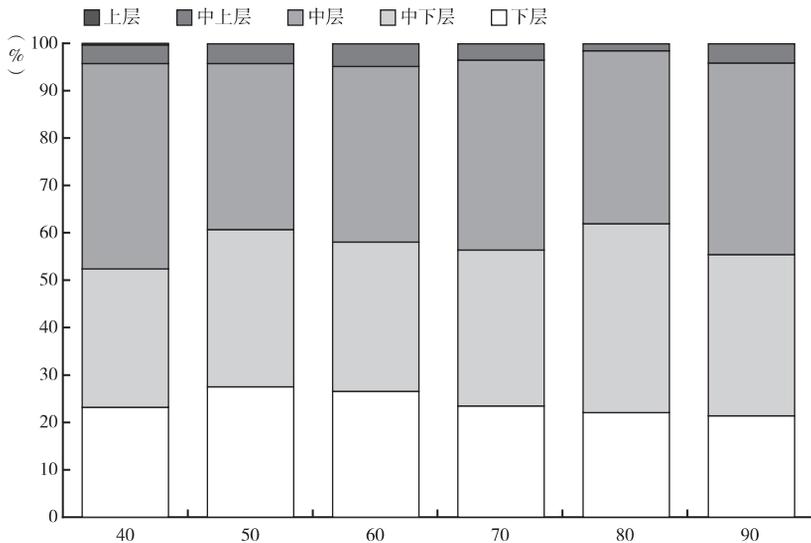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代际中等收入群体主观身份认同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随后，我们也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在相对剥夺感、焦虑感以及制度性歧视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相对剥夺感的重要测量指标之一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结果显示，中等收入群体基本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公平情况属于比较公平。例如，就高考制度来说，有 83.4% 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比较公平或者很公平，仅有 16.6% 的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公平。然而，就财富及收入分配来看，有 57.1% 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比较不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超过了半数。这其中，有 12.5% 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当前我国的财富及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平；同时，数据还显示，就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来看，有 54.1% 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比较不公平或者非常不公平，也超过了半数。这其中，有 10.5% 的中等收入群体认为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非常不公平。

表 1 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认知和相对剥夺感 单位: %

调查项目	非常不公平	不太公平	比较公平	非常公平
高考制度	3.6	13	64.2	19.2
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5.7	27.7	58.6	8
司法与执法	4.9	28.6	58.8	7.7
公共医疗	4.3	23.4	64.4	7.9
工作与就业机会	6.6	40.3	49.3	3.8
财富及收入分配	12.5	44.6	39.4	3.5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6.8	30.5	55.4	7.3
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10.5	43.6	42.6	3.3
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	2.8	25.8	68.5	2.9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本调查发现，中等收入群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感，具体而言：在对社会保障的态度上，有 18.5% 表示非常同意“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的作用”的说法，46.7% 表示比较同意这一说法。除了对基本社会保障的焦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有着较重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例如，在中等收入群体中，20.1% 的人表示子女教育费用难以承受；30.4% 的人表示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33.6% 的人表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34.4% 的人表示居住条件较差，且无能力改善；38.5% 的人表示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54.4% 的人表示物价上涨快，影响生活水平。有近 1/3 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生活中有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在涉及就业、医疗、住房和物价上涨等基本民生领域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表 2 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社会压力与焦虑感 单位: %

调查内容	是	否
住房条件差建不起房	34.4	65.6
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	20.1	79.9
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	33.6	66.4
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	54.4	45.6
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	38.5	61.5
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	30.4	69.6

当前我国制度性歧视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歧视，而户籍制度歧视则可能引发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性歧视问题（肖玉、肖建华，2005；张智勇，2005；高阳，2013）。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户籍制度歧视这一指标来进行制度性歧视分析。调查数据表明，就个体生活满意水平来看（问卷采用1—10分计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农民工）在各方面的得分均要低于没有受到过户籍歧视的群体（城镇居民）。此外，在对政府工作评价的数据处理上，我们将选项“很好”“比较好”赋值为“1”代表“好评”，“不太好”“很不好”赋值为“0”代表“差评”，计算“好评”百分比，可以发现受到过户籍歧视的群体对政府工作好评的占比在各个方面都要低于没有受到过户籍歧视的群体。而这种对政府工作评价的差异反映了户籍身份（即是否受到户籍歧视）会影响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最后，受访者还就社会整体状况进行了1—10分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好，10分表示非常好），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对社会整体评价仅为6.08（ $SD = 1.68$ ），没有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对社会整体评价为6.41（ $SD = 1.61$ ），两者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p < 0.01$ ），具体结果见表3。

表 3 户籍歧视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评价的影响

调查内容	整体生活满意度							
	就业满意度		教育满意度		经济度情况		整体生活满意度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5.86	2.11	4.19	2.38	4.52	2.10	5.83	2.04
没有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6.57	2.15	5.24	2.33	5.40	1.97	6.54	1.87
T 检验显著性	0.001		0.000		0.000		0.000	
调查内容	政府工作评价（好评百分比）							
	提高透明	服务意识	发展经济	提供社保	医疗	就业	总体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41.7	38.8	43.2	55.3	63.5	38.5	52.6	
没有受到户籍歧视的群体	56.0	54.0	59.0	69.4	73.7	54.5	66.6	

户籍制度本应当只是社会管理的统计工具，而在当前却与每个公民的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紧密相连。因此，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虽然在经济收入上成为社会中间阶层，却因为在各类权利上与有户籍者存在差距，继而产生了“不公平感”和“被歧视感”，而这种制度性歧视极有可能会对其社会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 中等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下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这里，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为受访者是否认同其属于社会中产阶层（1：认同属于社会中产阶层；0：不认同属于社会中产阶层）。主要自变量为焦虑感、相对剥夺感、进城务工群体等。通过建立广义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检验了前面提出的假设，具体结果见表 4。

表 4 当前我国社会中产收入群体身份认同的广义 Logistic 模型（样本量：3914 人）

变量	B	标准误差	显著性	exp (B)
年龄组（参照组为 70 后）				
“40 后”群体	0.647	0.204	0.002	1.910
“50 后”群体	0.558	0.170	0.001	1.747
“60 后”群体	0.245	0.108	0.024	1.278
“80 后”群体	-0.411	0.179	0.022	0.663
“90 后”群体	-0.132	0.048	0.031	0.876
政治身份（参照组为党员）				
共青团员	-0.034	0.151	0.822	0.967
群众	0.047	0.105	0.654	1.048
受教育年限	0.026	0.011	0.051	1.026
进城务工群体（参照组为城镇居民）	-0.364	0.146	0.013	0.695
就业部门（参照组为无业群体）				
政府部门	0.370	0.209	0.077	1.448
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	0.326	0.132	0.014	1.385
民营企业	-0.579	0.176	0.001	0.560
个体经商	0.459	0.151	0.002	1.582
财富收入不平等	0.029	0.011	0.051	1.029
社会保障焦虑	-0.049	0.015	0.049	0.952
养老保障满意水平	0.051	0.014	0.036	1.052
医疗保障满意水平	0.074	0.012	0.006	1.077

通过采用修正的广义 Logistic 模型，本研究基本验证了前面提出的假设。首先，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同中产阶层的身份（ $\exp\beta = 1.026$ ， $p = 0.051$ ）。同时，

模型再次验证，不同年龄组在中产阶层身份认同上的确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与“70后”相比，“40后”、“50后”和“60后”群体更倾向于认同自身的中产阶层身份，而“80后”、“90后”群体则更倾向于不认同自己的中产身份，代际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同时，焦虑感假设也得到了验证，即“焦虑感越强和生活压力越大，不认同中产阶层的身份的可能性越高”，这一假设分别在社会保障焦虑（ $\exp\beta = 0.952, \rho < 0.050$ ）、养老保障焦虑（ $\exp\beta = 1.052, \rho < 0.050$ ）和医疗保障焦虑（ $\exp\beta = 1.077, \rho < 0.050$ ）这三个维度上达到了统计的显著性。就相对剥夺感假设来看，越倾向于认同当前社会财富收入不平等的群体，其不认同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的可能性越高（ $\exp\beta = 1.029, \rho = 0.051$ ）。此外，就制度性歧视假设来看，“制度性歧视感越强，不认同中产阶层身份的可能性越高”这一假设也在模型中得到了验证，本文通过户口性质来对制度性歧视进行检验，相较于城市户籍的居民，进城务工群体即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户籍群体更倾向于不认同其中产阶层的社会身份（ $\exp\beta = 0.695, \rho < 0.050$ ）。

（三）不同世代中等收入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不同世代的群体在各职业中的身份认同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政府干部”中，“40后”和“50后”群体认为其属于中产阶层的占比要远高于“80后”和“90后”群体。而在“个体经商”中，“80后”和“90后”群体认为其属于中产阶层的占比要高于“40后”和“50后”群体。但在“国有企业管理”“民营企业管理”“专业技术”等职业中，这样的代际认同差异却并不明显。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个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情况所受的影响因素较多，仅仅做简单的交互分析并不能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需要通过控制其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对其进行更精准的分析。

因此，我们通过控制相关变量对不同年龄组的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进行了 Logistic 分析。在这里，我们把“40后”、“50后”、“60后”的中老年群体与“70后”、“80后”、“90后”的中青年群体的中产阶层身份认同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5。

对中老年群体来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群体相较于无业群体更倾向于认同自身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 $\exp\beta = 2.514, \rho < 0.100$ ），而个体经商的群体与无业群体相比，在是否认同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显著（ $\exp\beta = 1.394, \rho = 0.171$ ）；对于中青年群体来说，个人经商群体（相较于无业群体）更为倾向于认同其中产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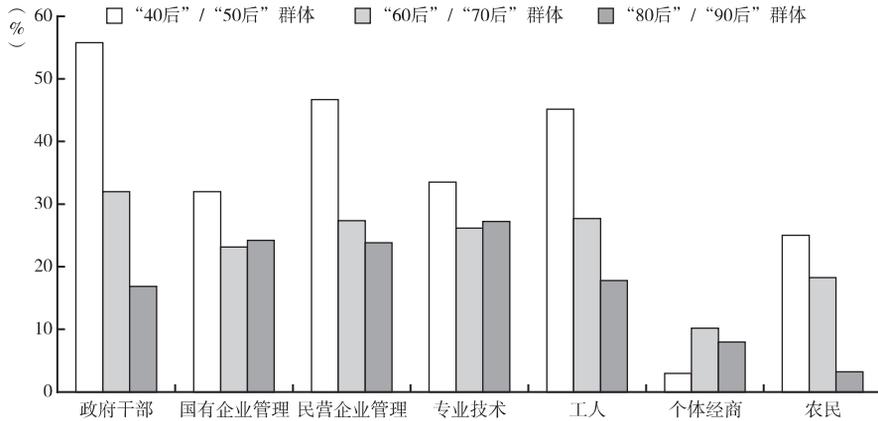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代际群体在各职业中的中产身份认同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层社会地位 ($exp\beta = 2.358, p < 0.000$)，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群体与无业群体相比，在是否认同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不显著 ($exp\beta = 0.916, p = 0.912$)。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以往学者提出的“参照系转移”的观点。

表5 不同年龄组中等收入群体身份认同的 Logistic 测量模型 (样本量: 3914 人)

变量	中老年群体				中青年群体			
	B	标准误	显著性	exp (b)	B	标准误	显著性	exp (b)
性别 (参照组为女性)								
男性	-0.301	0.212	0.15	0.740	-0.741	0.241	<.001	0.477
政治身份 (参照组为党员)								
共青团员	2.291	1.399	0.101	9.885	0.642	1.171	0.591	1.900
群众	0.472	0.395	0.241	1.603	-0.471	0.414	0.267	0.624
受教育年限	0.011	0.032	0.030	1.011	-0.017	0.041	0.086	0.983
进城务工群体 (参照组为城镇居民)	-0.543	0.281	0.050	0.581	-0.189	0.309	0.559	0.828
就业部门 (参照组为无业)								
政府部门	0.922	0.539	0.089	2.514	-0.088	0.741	0.912	0.916
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	-0.497	0.431	0.268	0.608	0.321	0.429	0.451	1.379
民营单位	0.061	0.300	0.857	1.063	0.315	0.328	0.345	1.370
个体经商	0.332	0.241	0.171	1.394	0.858	0.281	<.001	2.358
财富收入不平等	0.346	0.142	0.010	1.413	0.208	0.151	0.201	1.231
社会保障焦虑	-0.011	0.141	0.050	0.989	-0.166	0.157	0.312	0.847
常数项	-2.680	0.861	<.001	0.069	-0.679	0.910	0.461	0.507

此外,对中青年群体来说,相对剥夺感对其中产身份认同的影响 ($exp\beta = 1.231, p = 0.201$) 并不像其在中老年群体中的影响 ($exp\beta = 1.413, p = 0.010$) 那么显著。从焦虑感假设来看,中老年群体的焦虑感越强和生活压力越大,不认同中产阶层的身份的可能性越高 ($exp\beta = 0.989, p = 0.050$); 而与之相比较而言,中青年群体的社会保障焦虑对其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exp\beta = 0.847, p = 0.312$)。从制度性歧视假设来看,模型通过户口性质对制度性歧视进行检验,制度性歧视对中青年群体中产身份认同的影响 ($exp\beta = 0.828, p = 0.559$) 也并不像其在中老年群体中的影响 ($exp\beta = 0.581, p = 0.050$) 那么显著。

五、分析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基本证实了中等收入群体中不同世代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存在代际差异。且调查结果显示,代际差异可能源自深层次的价值观差异,即价值观的不同带来的价值判断、工作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 (Dencker et al., 2008) 可能是社会阶层认同差异的来源。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会对群体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产生重要影响,明显的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常常会出现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 (陈玉明、崔勋, 2014)。从本文的数据分析来看,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群体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坚持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因此倾向于基于政治身份建立中产阶段认同,他们认为体制内工作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重要判断标准。而“80后”和“90后”群体作为新生代的社会群体,他们成长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受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因此在阶层认同上更依赖其对自身经济身份的判断,认为金钱收入、市场机遇、资源的占有是判断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标准。造成这种代际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主要原因是不同世代群体成长和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个体经历带有不同的时代烙印。有学者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可能会导致不同中产阶层的性格特征 (李路路、李升, 2007)。本文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观点。

另外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阶层地位下移现象在本文中也得到了验证。而如前文所述,这种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现象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会产生诸多负面影

响。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中产阶级应当占主要部分。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对社会整体价值观有着高度的认同，他们在政治取向上较为保守，对社会改良有着较高的容忍度和宽容心。同时，在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里，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中产阶级对政府的反馈也通常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或者颠覆性的。同时，中产阶级更倾向于建设性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以体制内的渠道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和客观收入之间的错配现象，这反映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客观收入上形成的橄榄型社会并不等同于主观认知上的橄榄型社会。

调查数据表明，这种主观认知和客观收入的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对剥夺感对中产阶级认同的影响。虽然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是，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导致中产阶级在主观阶层认同上更加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下层。这种认同极有可能会导导致社会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趋同于社会底层群体。

同时，这种错配现象也反映了焦虑感和生活压力对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影响。从数据来看，当前部分中产阶级在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和物价等方面感受到了较大的压力。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保障方面还不够完善。受社会保障焦虑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中产阶级的主观阶层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认同下移的情况。

此外，制度性歧视也使得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完全认同其属于中产阶级，导致阶层认同错配。通过数据可以看出，现有的户籍制度安排使持有不同户籍的居民在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上有显著差异，进城务工人员更偏向于不认同其中产阶级的社会身份。这种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导致部分人虽然在经济收入上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在以户籍为代表的社会身份上很难认同中产阶级这一标签。换言之，中产阶级这一标签在内涵上应当包含平等的公民权利，完整的公民身份，稳定的社会心态，正面的政府评价和较高的生活满意等意涵。但是对于因户籍制度藩篱而处于“二等公民”的非本地户籍群体，因为没有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从而导致其在中产阶级认同上易出现下移倾向。

总体而言，由于受社会环境变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70后”、“80后”

和“90后”群体与“40后”、“50后”和“60后”群体在社会阶层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代际差异一方面展现了不同代际群体自身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分化。此外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认同的下移反映了社会中产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等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也削弱了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在心理上认同中产阶级社会身份的基础。

六、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不同世代的群体间社会阶层的认同方式有所不同，中等收入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下移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相当一部分在经济收入上已经成为社会中收入群体的民众在社会身份上却更加认同社会下层的身份，而并不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在政策建议层面，本文认为，要提高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政府部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工作。

首先，应当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国家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制度向中等收入群体和底层群体倾斜。消除不公平的利益输送，减少和消除社会特权阶层的存在，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在经济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方面的均等化。如果社会中存在着特权阶层，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在分配上向特权阶层倾斜，则必然会增加民众的不平衡心态和相对剥夺感。要调整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必须实现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的问题，这既需要进一步通过市场化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也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消除灰色收入的渠道，合理调整财富再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

其次，应当大力促进民生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切实提升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提高公众内在的安全感。只有在社会保障政策领域提高福利保障水平，消除养老医疗等问题造成的内在焦虑，才能切实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阶层认同。从数据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主、部分个体经商户、中高等级技术工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和专业种植养殖户，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享有体制内的社会福利保障。对于这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体制内群体享有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一旦在生活中发生重大意外，生活质量便有可能大幅度降低，从而成为低收入群体甚至贫

困群体。因此，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阶层认同，就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

同时，应当逐步消除具有制度性歧视的社会政策，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不因户籍身份等制度性的差异造成公众社会身份认知上的偏误。只有逐渐剥离户籍制度与其他社会福利之间的关联关系，消除户籍制度在公民身份界定、公民权利划分的负面作用，还原户籍制度应有的社会统计和社会管理功能，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上述领域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有效转变当前存在的一些负面社会心态，真正实现财富收入分配领域橄榄型社会与社会阶层认同领域橄榄型社会的同步构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陈玉明、崔勋，2014，《代际差异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研究评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13期。
- 冯仕政，2011，《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
- 高阳，2013，《论就业歧视的制度性根源——户籍制度》，《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6期。
- 高勇，2013，《地位阶层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第4期。
- 洪岩璧，2015，《Logistic模型的系数比较问题及解决策略：一个综述》，《社会》第4期。
- 莱德勒，埃米尔，1912，《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
- 李培林，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第1期。
- ，2015，《中产阶层成长和橄榄型社会》，《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2014，《建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问题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李培林、李春玲、田丰、范雷、朱迪，2017，《社会转型期的中等收入群体变迁（专题讨论）》，《河北学刊》第2期。
- 李春玲，2003，《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2015，《需培育全面小康社会心态》，《经济日报》12月17日。
- ，2016，《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文化纵横》第4期。
-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欣，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肖文涛，2001，《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
- 肖玉、肖建华，2005，《户籍制度——我国就业歧视的制度性原因》，《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

1 期。

张智勇, 2005, 《户籍制度: 农民工就业歧视形成之根源》, 《农村经济》第 4 期。

钟茂初、宋树仁、许海平, 2010, 《中产阶层的定量界定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趋势》, 《未来与发展》第 2 期。

朱迪, 2017,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趋势: 2006—2015》, 《河北学刊》第 2 期。

Mills, C. Wright 1969,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ncy, Birdsall, Carol Graham & Stefano Pettinato 2000, “Stuck in Tunnel: Is Globalization Muddling the Middle Class.” Working Paper No. 14,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Scheepers, Daan & Naomi Ellemers 2005, “When the Pressure Is Up: The Assessment of Social Identity Threat in Low and High Status 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 (2).

Allison, Paul 1999, “Comparing Logit and Probit Coefficients Across Group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8 (5).

Long, J. Scott & Jeremy Freese 2006,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2nd Edition. College Station, Texas: Stata Press.

Dencker, J C, Joshi A & J J Martocchio 2008,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Linking Generational Memories to Workplac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18 (3).

Rijmen, F & De Boeck P 2002, “The Random Weights Linear Logistic Test Model”,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6 (3).

Williams, R. 2009, “Using Heterogenous Choice Models to Compare Logit and Probit Coefficients Across Group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37 (4).

Yatchew, A & Z Griliches 1985, “Specification Error in Probit Model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 (1).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崔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黄永亮)

责任编辑: 陈咏媛

the court judgment shows special attention on the difference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ntext. The case also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legislation on cultural works in China. However ,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lklore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ity”; but Chinese folklore represents a characteristic of “nationality”. The article intends to seek the best protected mode of folklore , starting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folklor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legal terms.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 to Formal Institution: A Key Factor for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thnomedicine Based on the Case of *Li-Medicine*

..... *Zhang Xiaomin* 169

Abstract: Li-herbal-doctor/li-medicine is now at an illegal status , which is a typical cas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 li-medicine is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 , which hinders its further marke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 and fails to satisfy the socioeconomic requirement for it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ase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transforming proces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medicine in Wuzhishan City , and finds that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uccessfu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Li-medicine to obtain legal recognition is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to a formal one.

SURVEY REPORT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tatu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China: A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ng An Olive-shaped Society with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 *Cui Yan & Huang Yongliang* 19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statu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in current China , aiming at reveal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live-shaped society and its solidarity rely on not only the objective income , but also the middle-class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CSS2015 b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 downward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status in the middle income groups , and a divergent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statu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them. In this way , we suggest policies include further adjust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mote social welfare for people’s livelihood so as to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social policies gradually.